

乌托邦重建与解放政治哲学

——对戴维·哈维资本主义空间批判的反思

尹才祥

【摘要】乌托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解放政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形成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规范维度和尺度的重要资源。但是,在乌托邦的设计中存在不同的倾向。哈维提出的是时空结合、后现代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所谓新的“辩证乌托邦”。这里关键是重新建构地方和城市的正义与权利,如此才能形成现代和当代解放政治的进展。

【关键词】辩证乌托邦;地方重建;城市正义;城市权利

【作者简介】尹才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大学哲学系。

【原文出处】《哲学动态》(京),2016.11.38~4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5M57043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MLB00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SJB054)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人才启动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哈维在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和一些学者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应该重视时间和空间的结合,将时间性的历史和空间性的地理结合起来,从中获得对社会历史的正确看法,并在当代社会政治中推进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和革命。他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结构中有一个富有内容的设计,那就是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形成一种对未来社会的新的描绘,形成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即辩证的乌托邦。

在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思想中,乌托邦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是悲惨的现实社会中所没有的一个理想的、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众多问题的地方。在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如托马斯·莫尔和实践家如罗伯特·欧文那里,乌托邦的构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社会主义在早期就是作为一种理想、空想和乌托邦示人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努力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同

时,这也给历史唯物主义的实现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理论方向和实践指南。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哲学中,乌托邦传统依然受到重视。比如恩斯特·布卢赫就探讨过乌托邦的解放意义。在今天,乌托邦变成了一种希望和向往,一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设计和实践依然有生命力,甚至成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尺度。

当然,在功利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背景之下,乌托邦从未摆脱被批判和质疑的境地,但乌托邦冲动却从未因其式微而逐渐走向消亡。在20世纪,激进乌托邦的基本目标是从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宣言中演化而来的,即试图去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但激进乌托邦主义者似乎只能通过解释世界而为世界的自我维持提供某种理论资源,其理论总是背弃自己“改造”世界的冲动,从而当在理论层面上饱受诟病的同时,在实践层面上归于失败。在这种思潮中,戴维·哈维有别于其他激进乌托邦主义者,他在人文地理学与激进政治学之间坚持乌托邦

与现实运动的结合,以这种平实的综合视角,避免了上述激进乌托邦的主要局限,从“时空辩证法”的角度阐释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辩证乌托邦”的合理性,并通过“地方重建”和“捍卫城市正义和权利”,诠释其理论冲击力和现实解释力,探讨乌托邦理想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可能性。哈维申明要重振乌托邦精神,重新理解乌托邦的当代政治哲学意义和作用。

一、解构传统乌托邦

乌托邦是批判资本主义现存状态的前提,也是未来美好社会的愿景。哈维首先从思想上对乌托邦理想及其实践活动进行反思,认为需要重新面对乌托邦传统,重构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形成新型的“辩证乌托邦”。在此过程中,他最初以城市问题为焦点,逐步扩大到以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中心视域,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进行全面扫描。其洞见在于他不是对传统激进乌托邦进行简单的质疑和批判,而是以不平衡地理发展作为理论中轴,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各种矛盾及其后果,进而把自己的正面主张和建设性意见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他对资本主义历史局限及空间生产提出批判,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更加普遍化的替代方案即“辩证乌托邦”,为解放政治提供理论支撑。

第一,对空间形态乌托邦的批判与反思。哈维认为,空间形态乌托邦主要体现为对社会空间的一种理想性永恒规划,这压制了社会过程辩证法。较为典型的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为实现其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而设计了一个“乌托邦”——人工制造的孤岛。这是一个孤立、有条理、有组织且主要是封闭的空间系统,其内部空间秩序的安排调节着一个稳定的、不变的社会过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莫尔排除了那些对其“乌托邦”可能构成威胁甚至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力量,这主要集中在生产、交换和流通领域,如货币、私有财产、剥削、商品

交换、资本积累和市场过程,并对乌托邦中的民众灌输和强化“劳动光荣”、“奢侈享乐可耻”等意识形态。莫尔认为社会的快乐完美和精神秩序就取决于这些排除行动。

在哈维看来,这种空间形态乌托邦之所以难以成功,并不完全在于其内部没有时间安排,而是时间从属了空间,以一个想象的地理控制着时间、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可能性,并没有设想未来,认为目前预期状态已经达到。为了使这个快乐稳定的状态永远存在,空间形态乌托邦排斥了“伟大的历史原则”,试图以一种固定的空间形态来维系和保证社会的稳定。在此过程中,社会过程辩证法被压制了。虽然莫尔的空间形态乌托邦中的空间秩序安排的无限可能性,为社会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提供了前景,但“任何复兴乌托邦理想的计划都要考虑它在历史地理学中作为建设性和破坏性变革力量是如何运作的,并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①。

哈维进一步认为:“莫尔实际上从众多可能的空间秩序安排中选择了一种作为表现和固定某种特定精神秩序的方式,这不是一种独特的思想”^②,只能是“空间游戏”的一个种类。空间形态乌托邦理想与实际的资本流动体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其实质是试图通过维持自身的自足一体化和封闭性来维持自身的同质性和固定化。更为关键的是,“想象的自由运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权威的存在和限制性管理形式。”^③即想象的自由运用与权威和控制之间的辩证法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虽然这种任意想象“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学”,已成为探索和表达有关社会关系、精神秩序、政治经济体系等众多观念的一种成熟手段,并证明了人类想象对社会空间方案的探索能力,但这也使得其后的人们敏锐地意识到它与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其中隐匿着某种无形的威压,并最终与空间形态乌托邦所努力实现至善的普遍正义的目标背道而驰。这值得我们反思。

第二,对社会过程乌托邦的批判与反思。哈维认为,“时间乌托邦”是与“空间形态乌托邦”相对的

传统乌托邦的另一个极端,也称“社会过程乌托邦”。社会过程乌托邦强调乌托邦理想内含于社会过程之中,与社会历史过程不可分割,所以这种社会过程理想化样式通常以纯时间来表达,空间和地点的特性完全被忽视了。较为典型的如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乌托邦。哈维指出:“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的地点。”^④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时代中的创造性毁灭和不平衡地理发展,正是由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实施空间重组的结果:“嵌入在市场过程的乌托邦理想中的循环和累积的因果关系使得财富和权力在地理差异上越来越大,而并不是朝着同质性和平等性逐步发展。”^⑤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迷失在自由市场乌托邦过程中的创造性毁灭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

二、重建“辩证乌托邦”

哈维一方面着眼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揭露,另一方面不像传统乌托邦主义者迷恋于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设计,而以时空辩证法来阐释资本积累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哈维通过重建“辩证乌托邦”,使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显露出解放政治的光芒,也为他的理论走向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空间形式和社会过程这两种乌托邦设计都存在缺陷和困难,不仅理论设计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而且还存在理论与实践严重分离的错误。列斐伏尔和罗伯特·昂格尔都致力于探究解放的方案,前者虽然坚决反对空间乌托邦的封闭性和独裁性,而坚持作为一个不断开放的可能性持续下去的空间生产,但其实际替代方案却令人失望,原因在于“历史过程控制了理应控制它的那个空间形式”,“也合理地归因于被动员起来实现它们的那些过程”^⑥。后者坚持认为替代方案应该出自对既存制度、个人行为 and 习惯的批评和实践斗争。为此,昂格尔设想了三个主

要的制度改革领域:管理章程、系统组织和权力体系。在哈维看来,昂格尔虽然考虑了社会秩序安排的空间模式,但缺乏“历时”性思维。因此,未来乌托邦不应以这种“非此即彼”的某种幻想的方式来构建,而应从空间形式和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的分离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把传统乌托邦从其片面性中解放出来。最明显的替代方案就是建立一个必须包含空间和时间生产的乌托邦构想,即明确的时空乌托邦构想。空间和时间不能有目的地分开,而且重构乌托邦必须从资本主义现状出发,发现革命的种子,寻找突破口。

实践证明,“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不得不与它意欲控制的社会过程相妥协,从而与它们的崇高目标相悖。现在我们也发现,已实现的社会过程乌托邦必须与空间性和地点地理学相协商,因而产生了许多情况下完全违背初衷的结果”^⑦。哈维认识到乌托邦理论必须扎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丰富肥沃”的众多内在矛盾:即通过扩大资本积累来增加全世界的物质福利,这一长期计划没有能够履行它的诺言,实现的最多也不过就是不平衡的福利,甚至是骗人的福利。“辩证乌托邦”不仅需要有一个有关空间和时间操作的辩证法,还必须勇敢面对唯物主义的权威和封闭性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地缘政治所推动的历史地理学;这个替代方案不在于描述某个静态的空间形式或某个完美的解放过程,而在重振乌托邦理想的同时,揭示人类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轨迹及资本主义实质,为具有变革能力的解放政治提供基础。

如何摆脱资本逻辑的全球空间规划,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替代并最终走向解放政治呢?哈维主要从“重建地方”和“捍卫城市权利”两个方面,探讨了替代性方案的具体实践路径。他以“地方重建”作为其“辩证乌托邦”构想走向实践的重要方式,旨在“时空辩证法”的指导下,在资本循环中重构“地方建构”的政治经济学,也为在“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力图为了“在物质上、象征上和比喻上把地方解放出来”^⑧提供历史地理学的新路径。哈维强调对城市正

义和权利的捍卫,因为资本主义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联系。尽管探索并实现城市正义和权利只是实现反资本主义努力的一部分,但哈维依然把“捍卫城市正义和权利”作为实现激进乌托邦理想的重要一维,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城市正义和权利是对人作为城市主体而非奴役对象的呼唤,但这只是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起点,而绝非终点。

三、解放政治的实践

哈维把全球化解理解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全球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采取“空间修复”策略来解决过度积累的危机,即通过地理扩张将过剩资本转移到国外,谋求更大的逐利空间,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本对“地方”的袭扰和侵蚀。哈维试图通过“地方重建”来调和并抵抗资本运作,“地方”也因此成为他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工具和承载“辩证乌托邦”理想的“希望的空间”。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占有逐渐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主要方式,城市也因此成为资本和阶级斗争的集中地,由此衍生出城市的核心问题——城市正义和权利。哈维之所以重申城市正义和权利,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变化:“从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城市的空间生产在其生产体系中举足轻重,关乎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城市也必将在政治、经济以及阶级斗争中,成为中心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伟大起点。因此,哈维在其解放政治思考中,重申“地方重建”和捍卫“城市正义和权利”的重要性,这既是其“辩证乌托邦”从理论到实践的根本路径,也是走向解放政治的现实依托。

第一,地方的重建。“地方”是当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区位、场所和地方感是其三个基本面向,但西方学者对“地方”与全球空间规划资本逻辑的共谋与抵抗作用的言说并不一致。多琳·马西对哈维有关思想研究值得重视。哈维地方理论的展开首先建立在对亨利·列斐伏尔社会关系建构的承继

以及对海德格尔批判的基础之上。海德格尔对资本全球化以及“时空压缩”过程中所带来的“地方”地理学意义上边界的消失,深感恐惧和不安,认为“人的类性(humanness)与物的物性(thingness)在市场体系中被消解,从而威胁到了他推崇的存在主义的‘栖居’(dwelling)状态”^⑨。因此,他始终抵制将“地方”理解为开放的、能渗透的、变动中的空间,即“地方是意义铭刻其上的空间”^⑩。哈维认为,海德格尔的地方观可理解为对现实世界一种浪漫的逃避主义,是对地方“真正”意义渴望的回应。海德格尔渴望在所有的运动和改变当中能有一种身份认同上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种根深蒂固的“地方感”可以带来稳定和不容置疑的身份认同。事实上,海德格尔对“地方”的去市场化和去资本化的理解,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基于身份认同的地方主义和排他主义,人为地为本来应作为开放和可渗透的“地方”设置过多的边界限制,通过“身份认同”这种与外界相互对立的方式,诠释他所理解的一种防御性和排他性的“地方”^⑪。在哈维看来,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地方”无异于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它拒绝向一切社会过程妥协。

哈维认为,“地方”既是一种以排他的方式建立的“永恒”的空间构型,又是被社会过程所左右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地方”强烈的社会意义体现在它是社会与权力关系建构的载体,可能抵抗或接受地方建设之任何简单的资本主义逻辑,并成为“既与资本积累共谋又对其进行抵抗的场所”^⑫。“地方”与全球化所代表的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 and 开放性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基于身份认同的“地方感”在全球空间同质化的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与海德格尔不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理解哈维地方理论的基点,他直面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和外来文化对“地方”的袭扰,清楚地认识到“地方”建设离不开资本,也难脱权力关系建构,因为从“地方”和“认同”的关系出发,“地方”将不可阻挡地带来政治和文化的认同性反应。哈维承认地方的“差异和他性”,这也是其空间政治学的核心,但并不排斥认同,并且

认为把“身份认同和地方捆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基于传统力量的推动,在承认去中心化和多元认同的时代,他这种看待认同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哈维坚持地方的过程性与社会关系建构的辩证统一,他说:“我把地方理解为整个社会生态过程时空动态之中,那些相对‘永恒’所具有的内在的、异质的、辩证的和动态的构型”,“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建构”^⑧。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逻辑所决定的“差异和他性”是地方的突出特性,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张力“是由空间生产中的阶级斗争以及通过空间生产进行的阶级斗争来表明的”^⑨。他认为,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战斗的特殊主义(militant particularism)”,正是抓住了地方的“差异和他性”,进而在具体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抵制全球化对地方特殊性的消解,重塑地方、彰显地方特性,为政治寻求一种更加坚固的基础。应该说,哈维的地方观与海德格尔比较起来无疑更具开放和广阔视野,但哈维对基于身份认同的“地方感”的尊重,实质是对地方“差异与他性”的保护和捍卫,并以此调和资本运作,对抗全球资本的同质化无限扩张。

哈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立场,认为要谋求“地方”重建,就必须诉诸“战斗”,从而打破全球资本主义铁笼。在他那里,“地方”成为工人阶级反资本主义斗争嵌入的场所,它的存在不应屈从于资本逻辑或资本积累所给定的时空世界;要把地方重建的过程视为获得安全之地和归属感的过程,同时也是抵抗政治权力与资本肆意勾结、无所不在的支配的过程。哈维指出,“地方”作为空间形态的存在并非永恒不变的,因为制度化的资本体系及其全球流动不断超越地方的边界,总是不断为社会上强大的制度性势力所建构。在此意义上,全球化过程就是一个“削平”地方特殊性,“地方”不断地对地方进行空间剥削和压迫的过程。因而在反全球资本主义斗争中,使“地方”的“差异和他性”在空间中被生产出来,并得到进一步重塑与彰显就显得尤为重要。哈维认为,重建“地方”的斗争和“全球地方感的

保存”既是反抗资本剥夺式积累的政治基础,也是抵抗全球资本主义势力的有效形式,通过地方性斗争过程而进行的政治实践对抵抗全球资本主义具有世界性意义。哈维强调,重建与解放“地方”必须从全球反资本主义视野出发,因为“战斗的特殊主义”往往会形成一股排外的政治力量,被那些处于分裂的空间中的资本所控制,从而倒退到地方主义。哈维认同列斐伏尔的说法,即“受地方限制的特殊主义并不必然产生战斗的政治。他们往往容易成为政治消极性之地,或者是与占统治地位社会秩序合作共谋之地”^⑩。况且,“这种抵制并没有阻止通过资本积累而进行的地方建设的整体过程”^⑪。

第二,捍卫城市正义和权利。城市是空间形态乌托邦理想的典型载体,城市政治是实现解放政治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哈维辩证乌托邦构想从理论走到实践的重要一维。自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以来,得益于快速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城市乌托邦理想能够通过一大批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而在实践层面得到一定程度体现。但城市郊区的“私托邦”(privatopia)、“空间监控”和城市“门控社区”等“空间分异”现象的普遍出现,完全背离了城市乌托邦理想者所设想的美好愿景。城市化的实质可理解为一定区域中具有空间规模和空间差异的生产过程,这种在空间生产上的不平衡对于抵抗全球资本主义有着更加突出的意义,因此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现实目标应定位于争取城市生产者和再生产者的“城市正义和权利”。

哈维意义上的城市正义是指城市公民能够公平公正地享有城市空间资源的开发、分配、支配、消费和再生产的权利,具有空间性、差异性和流动性,是社会、经济、政治等权利的统一。城市正义通过城市权利来诠释,“城市权利不是专属个人的权利,而是一个集体的权利,也是一项政治权利。它的所有者不仅包括建筑工人,而且包括所有促进城市生活的人们:保姆、教师、下水道和地铁修理工、水电工、起重机械操作员、医院工作人员,卡车、公交车、出租车司机,餐馆工人和演艺人员、银行职员和城市管理

者”^⑩。也就是说,城市权利乃是全部在城市中生活的生产者和再生生产者,能够合理地决定城市空间生产并享受城市生活的综合权利。因而,“城市权利并不是作为早已存在的权利来解释的,而是在一个将城市作为社会主义政体的完全不同景象中,将其解释为重新建设和重新改造城市的权利,以求建立一个根除贫困和社会不公及治愈灾难性环境伤痛的城市”^⑪。对于城市生产者和再生生产者而言,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和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其拥有的所有权利中最为基础的权利,只有以此为基础,他们才能真正合理地享受城市生活。

哈维认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不仅使人类创造能力的全面发展受到阻碍,使人们无法合理地享受城市生活,而且也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遭受危机和停滞。他指出:“任何反资本主义的选择,必须解除调节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价值法则的权利,而这又必须消除控制和调节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持续扩张的阶级关系。正是这种阶级关系产生了日益不平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而这又伴随着将毁灭性压力施加于全球社会关系和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之中。”^⑫他进一步指出,城市权利的实质就是对城市生产中的剩余价值的使用和生产进行民主监控和管理的权利。

那么,怎样捍卫城市正义和权利呢?

第一,哈维认为,实现城市正义和权利首先需要更新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作’的概念必须从依附于劳动的工业形式的狭隘含义,转变为涉及城市化的日常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更为广泛的概念。”^⑬因为传统的“劳动”概念过于狭隘,它只包括了工业和农业中直接性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没有包含存在于流通和服务领域中的非直接性物质生产活动,因而只有将“劳动”的概念转变为“工作”的概念,才能使城市中不同的生产和再生生产者认识到自身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将他们团结起来共同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第二,为了使以城市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取得胜利,还有必要审慎制定“联合的行动”战略。

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城市中的建筑工人、产业工人和其他生产者和再生生产者,必须同城市中的社区建立紧密的联系,只有建立了这种广泛的、普遍的联系,“这种斗争才可能获得来自周边社区的大众力量的强有力的支援,这种斗争更有可能获得成功”^⑭。

第三,哈维强调,在反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上需要一场革命。进步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可以通过城市网络,推进向全球协调方向的跃进。此外,由于性别、种族和宗教等因素对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影响,这种斗争可能具有等级层次,而不一定是单一中心的,这就要求团结不同类型的城市生产者和再生生产者,防止资产阶级对已经组织起来的的城市力量进行分化和破坏。

结语

毫无疑问,“重建地方”与“捍卫城市正义和权利”,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满足了哈维建构“辩证乌托邦”所需的时间和空间要素,同时哈维还关注到理论与资本主义现实的结合,可以说,“辩证乌托邦”构想为迷失于传统乌托邦思潮、生存于资本主义困境中的人们指明了方向并带来了希望。就解放政治哲学的意义而言,他的“辩证乌托邦”构想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哈维准确把握到全球化时代的典型特征:不平衡地理发展所导致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全球化带来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在宏观上形成并进一步深化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二元结构;在中观上形成了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并使不同国家、民族、地区呈现多样化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权力分化和分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统一性在现实实践中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哈维以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从空间角度重新诠释差异性和多样化,反对传统的单一社会主义模式,重申差异性与多样性的重要性,并赋予其开启人类未来的重任,从而为寻求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这一点在他的辩证乌托邦构想走向实

践的过程中得到了有力印证。

第二,哈维从传统激进乌托邦思潮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把乌托邦构想与资本主义现实结合起来,以批判意识重建希望与实践的关系。从理论上,任何乌托邦学说都回避不了对替代方案的探究。哈维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基本立场,以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对当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进行批判,致力于寻求多元替代方案,如他的“重建地方”和“捍卫城市正义和权利”实践都在为把乌托邦方案变为现实作出不懈的努力。

但是哈维思想中的困难也是明显的。尽管哈维一再强调乌托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竭力避免“辩证乌托邦”构想陷入空想主义和改良主义,但仅以“辩证乌托邦”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困难。从理论上来看,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状况、经济条件、革命意识以及所表现出来的阶级、种族、生态目标各有不同,试图通过一种差异性的权力组合来实现一场改变现状的革命,这是哈维无法克服的困难。落实到实践中,“辩证乌托邦”虽然是一种动态的时空构想,但难以产生直接的现实结果,况且哈维并不是以一种阶级立场唤起革命的动力和斗争意识,这充其量只是理论姿态。

就哈维提供操作的具体方案而言,他试图以“地方重建”来调和全球化的资本运作,以此抵抗资本积累的大规模同质化扩张,但这种缺乏主体人的在场而唯“资本”的论说,并不能动摇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也无法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况且从当前现存资本主义体系攫取利益的全球势力也过于庞大。他“捍卫城市正义和权利”的斗争,没有从根本上挑战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也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和国家行动的模式。

总之,无论是“地方重建”还是“捍卫城市正义和权利”,在实践中都不得不屈从于资本主义体系,甚至为资本主义体系所利用,成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逆转和变异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哈维从经济主义的批判走向了非唯物主义。其实,阶级斗争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根源在于生产中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异化的反叛,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消灭生产中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允许资本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那种阶级关系,进而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抛弃物质的制约。在此意义上,哈维所提供的“辩证乌托邦”的实践方案,只是显露出解放政治哲学的微光,为人类走向未来社会指出了方向,但远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制度体系。值得重视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时间和空间发展呈现出和以往社会不同的条件下,需要重视地方建设、捍卫城市正义和权利的工作。这些工作是重要的,甚至是当务之急,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为未来进一步获得彻底解放打好基础。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需要重视的方面或维度。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戴维·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55页;第206页;第156页;第169页;第172页;第174页;第174页。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戴维·哈维:《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375页;第548页;第358页;第339页;第343页;第343页。

⑩⑪M.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Harper and Row, 1971, p.114, p.108.

⑫⑬多琳·马西:《保卫空间》,王爱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第191页。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D. Harvey,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Verso, 2012, p.120, p.128, p.105, p.128, p.114.